

012878

批評水滸贊刺集

續編

批判「水浒」资料集

(续 编)

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

一九七五年十月

目 录

批判投降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 谢 青 (1)

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 尚思文 (6)

林彪投降卖国主义的破产 辛 松 (10)

教育青年永远反对修正主义、投降主义

——充分利用《水浒》这部反面教材 袁 明 (16)

《水浒》：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论述 洪 柯 (23)

宋江的投降主义和金圣叹的反动昏庸

——学习鲁迅对《水浒》的两段评语 石望江 (29)

儒侠·奴才·蛀虫

——读《流氓的变迁》 陈允吉 (39)

谈金圣叹删《水浒》

——读鲁迅的《谈金圣叹》 严 日 (44)

梁山上的人并非都是“兄弟”

——读鲁迅《给姚克的信》

..... 武汉汽车起重机厂工人理论小组 (49)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

刘祯祥 聂敬华 (53)	评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 谢 作 (59)
投降主义路线的赞歌	
批判《水浒》对农民起义的歪曲	北大、清华大批判组 (72)
评《水浒》的投降主义 翟 青 (80)	
评投降派宋江 安 群 (90)	
要重视宋江这个反面教员的作用 黄 霖 (101)	
“替天行道” —— 宋江投降主义的一面白旗	齐 军 (111)
评宋江投降主义路线的思想基础 金学迅 (121)	
宋江和高俅是一丘之貉 洪广思 (128)	
搞投降就要篡权	
宋江是如何排斥晁盖，篡夺领导权的?	杭州缝纫机厂工人文艺评论组 (136)
谈《水浒》的结局	
北京市崇文区文艺评论组 (141)	论阮氏三兄弟 陈大康 (146)
北京市机械工业局工人评论组	论晁盖 杜恂诚 (154)
评金圣叹腰斩《水浒》	
兼驳胡适吹捧金批本《水浒》的谬论	闻 钟 (160)
评《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 梁 效 (170)	
《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必须批判 闻 毅 (180)	
历史唯物主义不容曲解 范 卉 (184)	

正确总结农民战争的历史经验

.....沈定平 曹贵林 何龄修(189)

农民起义史上招安与反招安的斗争.....南 谷(192)

宋江故事的流传和南宋的阶级斗争

.....吴泰 朱国焰 赵国华(200)

略谈《水浒传》版本.....柏 途(206)

投降派宋江的丑恶言行

——《水浒》故事摘评

.....上海市总工会工人评论《水浒》学习班(211)

宋江黑诗词批注.....齐 岑(235)

批判投降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学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

谢 青

二十四年前，毛主席为《人民日报》写的《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社论，以电影《武训传》为反面教材，全面地、深刻地阐明了什么是投降派，揭露和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指出了投降主义思潮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革命的极大危害性。这是一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批判投降派，坚持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强大思想武器。在当前评论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水浒》的过程中，我们重读这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倍感亲切。

毛主席指出：武训“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实际上“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毛主席通过对武训这个具体人物的分析，指出了投降派常有的伪装以及他们共同的反动本质和变化规律。

投降派与公开的敌人不同，往往不易为善良的人们所觉

察。他们混在劳动人民内部，打着“革命”的旗号，以假象欺骗人们。《武训传》中的武训，仿佛是“为穷孩子争取受教育的权利”而鞠躬尽瘁的“牛”，是劳动大众的“圣人”；《水浒》中的宋江，则俨然是“仗义疏财”、“能救万物”的“及时雨”，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一个反“劣绅”张举人，一个反“贪官”高太尉。这种表面现象将他们叛卖革命人民根本利益的丑恶行径遮掩起来，蒙蔽人们于一时。但是他们从“内里蛀空”，做到反动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因而，是更为危险的敌人。

然而，不论武训或者宋江这类投降派怎样挥舞各种“革命”的旗帜，高喊各种“动听”的口号，都具有一个本质的特点，这就是：“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是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反动的国家机器，这是鉴别革命派和投降派的试金石。列宁说：“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用暴力打碎陈旧的政治上层建筑”。上层建筑的主要部分是国家政权。武训和宋江，都不反对封建地主阶级政权的最高代表皇帝，不反封建剥削制度。武训的吹捧者们说，武训的“伟大”，是在于他一生都在搞“行乞”“兴学”，实际上正清楚地说明了他根本不触动封建制度一丝一毫。他把农民受压迫的根源，说成是不识字，没文化，以此掩盖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这个真正的罪恶根源，阻挡农民用革命暴力去摧毁它。宋江和武训具体的人生道路不同。宋江不搞文的那一套求乞兴学，而是搞武的“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反对“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革命口号。他反对高俅、童贯一类贪官，根本不是为了要推翻整个的地主阶级，也不是把他们作为封建政权的代表来反对，而是认为他们“闭塞贤路”；反贪官

是为了尽忠于皇帝，修补封建统治制度，同时自己得以“升官迁爵”，“青史留名”。由此可见，武训、宋江都是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混进人民革命运动内部，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投降派有时往往是剥削阶级中的失意者，是想当反动统治者的奴才而不得的饿狗。他们为了在统治阶级内部争得一席地位，走着一条曲折的道路，施展着两面派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在根本不触动剥削阶级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前提下作出革命的反抗姿态；另一方面向反动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他们混在人民内部，瓦解群众的斗志，叛卖革命的利益，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武训的道路，开始只反不许穷孩子识字的“劣绅”，不反封建文化和封建统治；继而卑躬屈膝地向一切地主豪绅（包括“劣绅”）乞求“扶持”，取得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然后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挽救濒于灭亡的清王朝。宋江的道路，则是开始只反“闭塞贤路”的“贪官”，不反皇帝和封建统治，继而奴颜婢膝地向整个封建统治集团乞求招安，成为“朝廷良臣”，最后残酷地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摇摇欲坠的北宋王朝。这就是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代表人物，混在劳动人民内部实行极其相似的投降主义的三部曲。毛主席所揭示的投降派的特点，有助于我们识别投降派的丑恶嘴脸。

投降主义路线有它的“理论”根据。要反对投降派、反对投降主义路线，必须摧毁其“理论”根据。毛主席在《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光辉文献里，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武训传》的作者和吹捧者怎样从阶级调和论出发，否定革命，歌颂投降。毛主席指出：“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

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象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毛主席的这些深刻的分析，对于我们今天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肃清《水浒》研究中的阶级调和论的流毒，也是完全适用的。

在《武训传》的作者和吹捧者看来，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坚持农民起义路线和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原则斗争是不存在的，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被剥削阶级反对剥削阶级的斗争，而是阶级合作，阶级调和。也就是说，一部封建社会史，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史，是农民阶级对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投降史。被《武训传》打扮成农民阶级的“圣人”的武训，最后怎么办成了“义学”，

“争取”到了穷孩子“受教育的权利”的呢？是因为他三十年中一味奴颜婢膝地行乞，眼泪汪汪地哀求，博得了地主豪绅们的“同情”、“捐助”和“扶持”。《水浒》则“巧妙”地以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的矛盾，来掩盖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尖锐对立这一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处处宣扬宋徽宗赵佶这个地主阶级的总头子“爱民”、“博施济众”，而革命农民则被歪曲为都想“忠心报答赵官家”，因此最后接受招安

是势所必然的。这是对历史的莫大歪曲。歌颂武训，肯定宋江，实际上都是鼓吹阶级调和论。

阶级调和论作为历史观，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从哲学上说，则是反动的“合二而一”论。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认为旧事物有绝对的稳定性，旧事物与新事物是并行不悖的，应“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用这种哲学观点观察历史，必然掩盖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对立关系，调和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反对革命运动。毛主席在这里严厉地驳斥了《武训传》及其吹捧者，告诉我们，历史的发展，总是新生事物不断战胜腐朽事物的过程。过去，很多关于《水浒》的评论文章，肯定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正是反映了这些文章作者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世界观。

“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就是：维护阶级合作”。建国以来所出现的利用《武训传》、《水浒》等封建文化鼓吹投降主义的思潮，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政治思想战线上严重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当年我们对《武训传》的批判和今天对《水浒》的评论，都是重大的政治思想斗争。这种斗争是长期的，正如毛主席在批判《武训传》三年后所指出的：“《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我们要认真学习《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这篇光辉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锐利武器，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原载《文汇报》1975年9月29日）

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

——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

尚思文

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认真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深入批判《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有助于我们识破投降主义、修正主义的真面目。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列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本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然而，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出于维护其反动统治的需要，无不千方百计地竭力掩盖国家的本质，抹煞国家的阶级属性。《水浒》的作者正是出于这一目的，拼命美化地主阶级专政，宣扬宋徽宗是“至圣至明”的“天子”，“那时天下太平，四方无事”，“国富民乐”，“士农乐业”，为宋王朝涂脂抹粉，歌功颂德。其实，作为北宋末年的地主阶级头子的宋徽宗，并不是什么“明睿圣君”，也不是什么“仁慈”皇帝，而是一个荒淫无度、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反动统治者。这个地主阶级的总头目、总代表，为维护其地主阶级利益和摇摇欲坠的封建剥削制度，利用其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剥削和极端残酷的压迫。地

主阶级对梁山泊农民起义军使用征剿和招安的反革命两手，便是一例。这充分说明了“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可见，美化以皇帝为象征的地主阶级专政，就是散布对地主阶级和封建皇帝的幻想，麻痹农民的革命意志，转移农民起义的斗争目标，取消农民夺取政权的阶级斗争，维护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制度。

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那末，国家就不可能是阶级调和的工具，只能是阶级压迫的工具。“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在封建社会里，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封建统治的工具。而皇帝则是最高的统治者，最大的官吏，是所有官吏的总代表、总后台。正如毛主席曾经指出的：“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因此，农民要起义，要造反，要反抗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就必须反皇帝，就必须用革命的暴力摧毁腐朽没落的反革命政权。梁山泊的起义农民如李逵等，他们反官府也反皇帝，提出了“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要“把那鸟官一发都砍了”，“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北宋皇帝。正是在晁盖的正确路线领导下，梁山泊农民起义军通过武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国家机器。而《水浒》却从根本上否定了晁盖的这条正确路线，鼓吹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完全勾销了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里，除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外，还有着地主阶级

内部的矛盾。每当阶级矛盾激化时，地主阶级中的某一集团，就会在反对贪官的骗人幌子下，转移革命人民的斗争目标。所以，宋江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无非是为了修补封建王朝所出现的漏洞，以便维护和延长封建制度的寿命。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作为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卫道士，当他们看到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并威胁到反动制度的时候，他们总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一方面力图强化军队，以维护这个反动国家政权；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瓦解旨在推翻反动国家机器的革命队伍，并利用它们替反动统治阶级镇压、扑灭已经燃烧起来的人民革命的火焰，以实现其“尽忠报国”的愿望。《水浒》中的宋江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走上乞求朝廷招安的投降道路就是生动的一例。号称“及时雨”的宋江乞求招安，完全符合宋王朝的反革命策略。一方面，宋江推行投降路线的结果，断送了梁山的革命事业，起了反动派用暴力镇压所起不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宋江受招安，使“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梁山农民起义队伍变质，成为帮助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农民起义的“官兵”。“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成为瓦解农民革命的蛀虫，残杀革命人民的刽子手。这就“及时”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反革命需要。

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揭露宋江搞修正主义、搞

投降主义的真面目，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水浒》竭力美化和歌颂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从反面说明，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斗争是不可调和的。

(原载《文汇报》1975年9月22日)

林彪投降卖国主义的破产

辛 松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当前，在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中，从古代投降派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我们党五十多年的历史证明，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他们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刘少奇、林彪都是如此，他们都是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我们要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的投降主义言行，把上层建筑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

中国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他们还掌握着统治权力的时候，总是要依靠帝国主义的力量，镇压人民的革命运动。作为地主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林彪，他反对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必然要投降卖国，而为了投降卖国，又必然要先造投降卖国的舆论。

林彪这个投降派、卖国贼，把孔孟之道所谓“小国师大国”的原则，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为他投降卖国寻找历史根据。孟轲说：“小国师大国而耻受命焉，是犹弟子而耻受命于先师也”。就是说弱小的国家应该服从强大国家的统治，屈膝投降并没有什么可耻，就象学生接受老师的教导而没有什么可耻一样。孔孟这种“投降有理”、“卖国有理”的论调，被林彪视为至宝，郑重地摘录下来，编入他的“四书集

句”之中，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林彪为了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竟然把孔孟的破烂作为他投降卖国的理论依据。

林彪这个投降派、卖国贼，还假惺惺地说什么“原子拿到再硬”，为他投降卖国寻找物质依据。他胡说什么“现代战争是按电钮的”，“不能靠步兵，要靠空军、原子、导弹”。按照他的意思，整个世界都要围绕核武器转，如果你没有核武器，就应该奴颜婢膝，跪在核霸王脚下，服从超级大国的奴役。这完全是建立在唯武器论基础上的投降卖国理论。我们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我们没有核武器，决不屈服于超级大国，我们有了核武器，也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去奴役别人。林彪说“原子拿到再硬”，但是当我国已经有了原子弹以后，他是不是“硬”了呢？他还是“硬”不起来，还要乞求苏修的“核保护伞”。可见，所谓“原子拿到再硬”，不过是骗人的鬼话，林彪本人不过是一条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

林彪这个卖国贼，为了投降卖国，还大力宣扬“侵略有功”的谬论，为他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苏修侵略、控制中国张目。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一伙竭力吹捧西方几个“称霸于世”的“强国”，硬说这些“强国”“对世界历史起了很大作用”，“影响世界整个历史进程”，决定“世界历史的命运”。他所吹捧的几个“强国”，都是在世界新航路开辟以来，先后走上殖民掠夺道路的侵略强盗。抢夺黄金，强占土地，贩卖黑人，贩卖鸦片，屠杀人民，建立霸权，是这些“强国”的共同事业。林彪把这些无恶不作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强盗描绘成为历史前进的推动力，人类命运的主宰，往强盗脸上贴金，用心十分恶毒。辩

护古人，是为了辩护今人。歌颂过去的霸权主义，是为了歌颂现代的“超级大国”。林彪如此露骨地歌颂“超级大国”，鼓吹“侵略有功”的谬论，正是为了迷惑群众，为他投降卖国，扑灭革命制造舆论。

林彪搞卖国主义，也就是搞民族投降主义。民族投降主义同阶级投降主义是有联系的。“**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林彪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大搞民族投降主义，这是与他一贯搞阶级投降主义分不开的。

早在土地革命时期，林彪就对中国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妄图放下枪杆子，取消工农革命武装。在王明搞阶级投降主义的时期，他又追随王明路线，写文章公开吹捧蒋介石是“最高统帅”，竟然要“国家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在以最高统帅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周围”。解放战争时期，他又同刘少奇一唱一和，兜售“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破坏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当我解放区各战场根据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全面进攻的时候，林彪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按兵不动，破坏中国人民与蒋介石的战略决战，给蒋家王朝以喘气时机，保存反革命力量，卷土重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逐步深入，林彪的阶级投降主义也在发展。他用孔孟之道的破烂武器，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过分”、“过极”，破坏了个人的积极性，反对我们清除资本主义的旧地基；用儒家的“德”、“仁义”、“忠恕”，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宣扬“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革命暴力。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对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更是怀着刻骨仇恨，诬蔑为“封建专制”，叫嚷要使地、富、反、坏、右“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